

评论员观察

# 关键是“能下”，难点是“真下”

李斌

**“能上”是一种激励，“能下”同样是一种激励。实现干部“能下”“真下”，并不是为了惩戒处分、排斥打击哪个干部，而是要建立优胜劣汰、奖优罚劣、激发全体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新机制**

去年7月，中央印发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(试行)》，要求通过健全完善制度机制，着力解决为官不正、为官不为、为官乱为等问题。据统计，截至目前已有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甘肃等至少12个省份出台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意见。“能上能下”的人事制度改革，即将进入全面铺开、系统实施阶段。

推进干部能上能下，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，促进干部干事创业、勇于担当的重要保障。邓小平同志早在1962年就指出过，干部能上不能下“副作用很大”，“要逐步从制度上、习惯上、风气上，做到能上能下”。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(试行)》的出台，从顶层设计上厘清了干部“能下”的情形、程序和责任主体。如今各地相继出台实施细则，是从细分领域、具体规范上予以对接和完善。随着这项制度进入实际操作阶段，一场能者上、庸者下、劣者汰的改革已然开启。

实现干部能上能下，关键是“能下”，症结在于不能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。干部

“能下”的6种情形中，退休免职、任期届满离任、健康原因调整和违纪违法免职，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制度化、常态化。对那些“没有大过、没有严重违纪违法，但在其位不谋其政、能力素质不适应”的干部，如何调整、如何对待，是解决干部“能下”问题的重中之重。这也是各地实施细则的一个突出着力点。比如湖北省的实施意见，把不适宜担任现职需要调整的情形扩充到20种，包括“参与封建迷信活动”“不服从组织安排，跟组织讨价还价”等内容。北京则增加了“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，在企业等经济实体兼职”等内容。

实现干部能上能下，难点是“真下”。过去干部能上不能下，原因不仅在于“下”的情形不明确、管道不畅通，更在于“下”

的执行力度不够大。比如干部问责制，在问责中被免职的干部往往被“高高抬起、轻轻放下”，沉寂三五月旋即恢复同等级别工作，甚至“明降实升”，令问责和“能下”失去效力。社会公众关心干部“能下”，关心的不是设定什么比例、指标，也不是季末年底的统计数据，而是有没有制度化的可实现路径，到底都是谁实现了“真下”。无论是中央规定还是各地细则，都将“严明工作纪律，不得搞好人主义”作为纪律原则。“令在必信、法在必行”，下一步要狠抓常态执行，真正实现制度落地有声、落实抓铁有痕。

人是需要被激励的，“能上”是一种激励，“能下”同样是一种激励。实现干部“能下”“真下”，并不是为了惩戒处分、排斥打

击哪个干部，而是要建立优胜劣汰、奖优罚劣、激发全体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新机制。许多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，毕竟没有犯下大过错，如果简单“一下了之”“打入冷宫”，只会加剧干部群体对“能上能下”制度的抵触心理。干部人事工作，不仅要管进也要管出，不仅要管人事更迭，还要能安抚心灵、团结干部。推动干部能“下”，也应完善“能下”之后的管理机制，对调整下来的干部跟踪了解思想状况和工作状态，对能力不足的强化培训，对存在困难的及时帮助解决，对存在问题的及时提醒教育。让干部“下”得服气服众，让干部群体受到激励触动，才能够起到激浊扬清、振奋干劲的重要作用。

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”推进能上能下，可以说是激发干部队伍活力的源头工程，能上能下、有进有出，才有干部队伍的“健康态”。让“能下”形成常态化激励，鞭策后进者，鼓舞先进者，营造“能者上、庸者下、劣者汰”的氛围，一定可以锻造出素质过硬、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。

人民时评

一些地方按照类似实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方式招徕人才，而这些人才究竟按照何种科学的评价体系予以界定，却越来越少有人关注

“过多的人才计划可能会耽误科研”“不要再人为制造不平等了，让学者们静下心来做学术吧”！日前，本报刊发的《人才“帽子”那么多究竟效果怎样》，在科技教育界引发热烈反响。

据粗略统计，各部门和各省市的“人才计划”，加起来有近百项之多。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就有政协委员直言：这种人才“帽子”满天飞的现象，在世界上都不多。应该说，相关部门和地方出台人才计划对我国的人才引进、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其贡献应予充分肯定。但令人眼花缭乱的“帽子”产生的负面效应，也同样值得警惕。

现实中，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本身就存在“以论文数量论英雄”的弊端，一些科研人员为了应付考评，想方设法快发、多发论文，专做那些短平快的跟风式研究；至于所做研究的创新性有多大，就无暇顾及了。其结果，就是产生了堆积如山的平庸论文，而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却不多见。我们实施各项人才计划，理应注意和努力克服这样的弊端，防止一些人的“路径依赖”，为了博取“帽子”而走到“唯论文数量”“唯项目规模”的老路上去，真正给人才成长以正向的激励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随着一些地方和研究机构把人才作为“形象工程”，出现了按“规格”订制“帽子”、以“帽子”配置科技资源的现象。甲类人才享受某种待遇、乙类人才可得多少安家费、丙类人才有资格竞争某类项目……一些地方按照类似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方式招徕人才，而这些人才究竟按照何种科学的评价体系予以界定，却越来越少有人关注。以至于有人说，前些年广受诟病的“院士崇拜”现在已经演化为各类“帽子”比拼，人才计划的良好初衷在执行中走了样。

不仅如此，良莠不齐、标准不一的“帽子”，还可能加剧本来就屡禁不止的“拼关系”和浮躁学风，无形中把科研人员划为三六九等，妨碍平等的学术交流，使追求真理、崇尚创新的科研活动日趋名利化……难怪科教界的有识之士呼吁：不能再让五花八门的“帽子”满天飞了！

总结人才“帽子”满天飞的乱象，首先要“正心”。实施人才计划的目，是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局出发、为具备创新能力和潜力的科研人才提供充足的经费，让他们安心心、踏踏实实搞创新。如果暗存私心，就会使人才计划异化为显示政绩的工程和谋取利益的手段，把一本好经念歪。

其次，要“务本”。这个“本”，就是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和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。无论是人才成长还是科学研究，最重要的是心无旁骛、长期积累，最关键的是淡泊名利、回归学术。因此，在实施人才计划时，应真正尊重、遵循这些特点，着眼于为具备创新能力和潜力的科研人才提供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，尽量把“帽子”与待遇、晋级、评奖等学术因素隔开。

再次，要“齐家”。人才“帽子”满天飞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当前与科研管理相关的政府部门较多。如果每个部门都要搞自己的人才计划，自然免不了各行其是资助重复、资源浪费。因此，应借鉴此前中央财政科技计划(基金、项目)改革的经验，加强、完善顶层设计，合理统筹各类人才计划，该取消的取消、该整合的整合，尽量减量提质。

当然，除了政府部门要正本清源、求真务实，科研人员也要正确对待“帽子”，不要为了追“帽子”而迷失方向。毕竟，真理的发现，科研的突破，首先需要的是一颗宁静淡泊的心。

## 别让『帽子』遮蔽科学的眼睛

柏木钉

新论

# 阳光体育，感受运动之乐

刘云

体育的魅力，是激发他们内在动力、实现“自主健身”的关键

不久前，江苏省发布试行了一项大学生体能考核指导标准，让江苏的大学生直呼“受不了”。根据这一标准，从今年秋季开始，该省大学生在进行体能考核时，男生将测试2400米，女生将测试2000米。学生纷纷“吐槽”的背后，反映出的现状是：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在下滑。

事实上，去年底，国家体育总局、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就得出相似结论。根据两部门分别发布的调研报告，我国中小学生身体素质正在向好，而大学生身体素质正在“向下”。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，当学生进入大学阶段，制度约束和管理力量相对减少，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就降低了。

基于这一现状，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房蕊教授在其著作《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概念模型建构与量表研制》中，提出了“自主健身”的概念，值得人们重视。房蕊基于广泛调研得出结论，中小学阶段，各级教育部门组织的体育活动多，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多，但一些学生并非自觉主动参与，而是迫于学校要求和达标压力，增强体质的持续性难以保障，更难以及娱乐健身的目标。因此，需要在中小学阶段大力提倡自主健身的理念。

运动健身是学生成长的一部分。让他们感受到体育的魅力，而不是一种负担，是激发他们内在动力、实现“自主健身”的关键。这就要求学校在开展体育活动时，不能仅仅将注意力放在场地、器材、技能要领等

内容上，而要通过耐心的引导、多样化的选择、内在的激励等手段，唤醒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归属感和认同感，让锻炼成为他们的习惯，不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放弃。

实践中，山东青岛、济宁等地的部分中学已将“自主健身”理念贯彻到体育教学中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这些学校的体育课教学改变了以往“放羊式”或“应试式”的状况，把出发点放在学生的需要上，充分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，鼓励学生大胆地去选择、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，享受体育运动给他们带来的快乐。在教学方法上，他们运用“自主健身”理论，把“超市”的经营理念引进体育教学课堂，课堂的教学要求不再是整齐划一的，而是向学生提供足够的“超市货物”，让学生自主地选择学习的内容。比如，除了将田径类项目作为必修课外，将球类、武术类、体操类以及新兴的、传统的、大众化体育健身娱乐项目作为选修课。必修课充分考虑学生整体提升体质所必需的运动量；选修课满足学生体育兴趣、爱好、自尊以及娱乐、休闲等“自主健身”精神。

总体而言，注重体育教育，提高学生体质，不能强制学生参与体育和健身活动，也不应泛泛而论地强调“发挥主体能动性”，而是要对学生健身的自主性行为有科学而深入地认识，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开展体育教育和阳光体育运动，从而切实提高学生体质。(作者单位：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)



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车在丛中嘛”“开往春天的列车”……不少人对去年“和谐号”列车穿越居庸关花海的美景记忆犹新。然而近日，当人们再次赶到居庸关时，却发现山路已暂时封闭。原因在于，一些“发烧友”前往山上拍照时吸烟，给森林防火带来极大隐患；同时，因为拍照的人站得离铁轨太近，还曾造成火车被逼停。

这正是：  
塞上风景异，  
赏花摄影季。  
良辰待佳客，  
谁解其中意？

勾 犇图 亦 多文

治理者说

#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

上海市崇明县委书记 马乐声

从新世纪初确立“生态岛”定位至今，崇明生态岛建设已走过10多个年头。2014年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《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报告》，把崇明生态岛作为典型案例，编入它的绿色经济教材，向全球42个岛国推荐。

崇明的广大干部群众曾对走生态之路有争议。有人看到一些地区经济总量比我们大，楼房比我们高，工厂比我们多，就心生艳羡；有人认为建生态岛，就是修路、种种树、治治水，不可能有广阔前景和发展空间。但随着生态岛建设深入推进，崇明的生态品质不断优化，民生持续改善，社会更加进步，老百姓的满意度、幸福感在提升，质疑声渐渐消散。坚持生态立岛，厚植生态优势，在今天绿色消费潮流下，崇明的生态优势已经具备了变成高附加值、高效益财富的潜力，已到了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临界点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新发展理念。站在“十三五”起点，我们提出“生态引领、创新发展”的发展主线，实施“生态+”发

展战略，用新思维审视和谋划生态与发展。我们所说的“生态+”，是一条更高形态的发展之路，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，不仅可以“+”产业，也可以“+”社会建设、“+”生活方式等，“+”的内容可以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更新、完善，让生态文明加快融入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。

比如“生态+农业”。绿色生态是崇明农产品的金字招牌，藏红花、石斛、灵芝等名贵药材纷纷落户，猕猴桃、火龙果、奶油草莓等高档水果四季更替。崇明的农产品基本上都符合绿色食品标准，“生态+”农产品让人更放心，崇明也成了上海市民放心的“菜篮子”，可以加快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变的步伐，促进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。

“生态+旅游”是实践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、实现优势转化的又一途径。崇明拥有上海“最蓝的天”“最好的空气”，美丽乡村、生态廊道、郊野公园、森林湿地、特色农产品都成了优质旅游资源。目前，我们正全力建设国际生态旅游岛、全域旅游示范区，探索农业、体育、文化、健康、医疗等领域“多旅融合”发展，吸引更多游客。生态岛建设没有先例可循，没有样板

可参照，实现优势转化，在于创新思维，要善于在大格局下谋划未来发展，把自身发展纳入上海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全球城市、科创中心的大战略中来谋篇布局。我们发展高效生态农业、打造大旅游格局、建设智慧产业，就是为了将崇明打造成“上海的大花园”“生态高地”。当然，实现优势转

点评

## 好生态也能当饭吃

泓 冰

寸土寸金的上海，一直舍不得为崇明岛“留白”。七八年前，上海就拒绝过针对崇明的几十亿投资项目。按“应保尽保、总量拓展”来科学划定生态红线，制定算大账、算长远账、算整体账、算综合账的发展战略，这需要连续几届领导人久久为功的责任担当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上海以及崇明人敢于并善于创新发展，用“生态+”思路建设世界级生态岛，使

这个上海唯一的“县”，成为未来发展形态的改革试验田，受到国际上高度认可。

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，要让生态可持续优化，就不能将“生态”与社会发展、民生改善相对立。希望有更多的地方，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，让好山好水好空气都能“当饭吃”，这也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种考验。

## 重拾家书，感受文字的力量

熊飒飒

近些年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人们的沟通方式发生巨大变化。过去的几十年，从书信、电话，到后来的聊天软件，再到如今的微博、微信，技术革新让生活日新月异，过去的一些生活习惯逐渐淡去。不过，依据这种更替来评判孰优孰劣恐怕不合适。比如，言及书信，除了被认为是一种过去时的沟通方式，大家经常还会产生一种怀旧情绪——远离了书信，似乎总觉得少了一点东西，于是有的人突发奇想给朋友写封信，对方收到信往往非常感动——寄信人以此“郑重”的方式与你沟通，这背后的情感该多么厚重！

互联网讲究效率，沟通快捷，信息快餐化，文字越少越好，能用表情不用文字，而书信则是一种慢文化。书信里的文字是用笔写出来的，它和在键盘上敲出来的字不同。靠信件沟通的时代，要付出较高时间成本，所以总会在信中写入更多内容、倾注更多情感，让人看到写信人丰富的内心。看看梁启超的家书你就可以发现，这位国学大师饱满且立体的人格画像，他既是充满爱国情怀的学者，在信中和子女讨论国家大事，也是一位体贴的父亲，时常事无巨细，嘘寒问暖。

家信丈量了家人之间的物理距离，也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。如今有了网络，交流成本很低，而且比以前更便捷，但这也有着“另一面”。想到哪就说到哪，因为成本低反而失去了交流的动力，和父母说几句便觉得无话可说。而且，网络时代隐私成了大问题，前段时间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参与调查的五百名家长中，80%加入了孩子的社交好友，但50%的学生对于家长涉足自己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圈表示反感。大家的距离很近，但心却隔得远了，这是技术带来的改变，也是社会学家所谓的“现代化的后果”。

网络时代有快的好，书信时代有慢的内容值得回味。1994年，那首《一封家书》的歌在全国各地走红，歌中唱到：“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吗？我在广州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牵挂，虽然我很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”如今读到这样的内容还会感动不少人，在外工作远离父母的你，可曾想写一封家书寄给遥远的家人？从去年10月开始，人民网联合中国邮政集团共同启动“家·信——为传统文化接力”大型公益活动，线上线下互动，“晒家书”“写家书”“读家书”，正是为了再次发现家书的文化价值、伦理价值和教化价值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“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。

2015年春晚一首《从前慢》打动了无数人，过多了“快”的日子，“慢”的东西会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，很多人开始思考“慢”。海子曾写道“从明天起，和每一个亲人通信/告诉他们我的幸福”，与亲人朋友沟通，感受文字的力量，获得有质量的沟通，正是书信在当下最大的意义。